

饶信文化

从古城的变迁,看上饶的文化

——饶信文化研究心得之三十四

建平

上饶,原本不叫上饶,而是叫广信府。上饶县只是广信府所辖的一个县。之后,又因为饶州与广信府合并,才把上饶县的“上”与饶州的“饶”并名,改称为“上饶市”。

横峰,原本不叫横峰,而是叫“兴安”。明嘉靖39年,从弋阳、上饶两县各划出一部分出来设立兴安。兴安县名义出“凡可以兴而安之者”,寓兴县而安之意。因与广西兴安同名,1914年改名横峰县。为什么要改名叫横峰呢?县志说:“以岑山横亘而得此名”。嘉庆十四年广信府知府王康言写过一首《兴安雨后即事》诗:“入山不见城,入城不见山。时有又飞翼,栖息斋阁间。朝与白云出,暮与白云还。城市如山林,未昏先掩关。”那时的兴安城依山而筑,山不高,林木茂盛,城很小,民居恬适。民谣有云:“小小横峰县,三家豆腐店,县衙打板子,城外听得见。”诗人雨后赋诗,所写的正是这种入山不见城,入城不见山的小城风光。

弋阳,原本不叫弋阳,而是叫葛阳。东汉建安十五年,也就是210年,“孙权析余汗县东境建葛阳县”。后来,因葛阳县印丢失,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县治由赭亭迁弋水之北”,改名为弋阳县。这也说明,县印、印章是多么的重要!

弋阳县的旭光乡,原来可不是一个乡,而是一个名叫宝峰的县。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建宝峰县,县城就在现旭光乡的铁砂街。当然,设县的时间不长,景祐二年(1035年)撤县设乡。也就是说,宝峰县的存在只有41年。

现在的万年县大源乡,原本也不是一个乡,而是一个县级建制的“荷溪”古城。明正德五年(1510年),同知

张禧在荷溪筑城,防御王浩八起义军进攻。正德七年(1512年),总制陈金奏建荷溪巡检所,这是一个县才有的机构。正德八年,巡检所迁至万年县城。

现在的鄱阳谢家滩英家,原本是一个古城池,叫英布城。《读史方舆纪要》载:“英布城,在府西北五十里,汉初吴芮筑以居布。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布散于淮南,走渡江,为长沙哀王所诱,至鄱阳,鄱阳人杀之于兹乡,盖即此地云”。

上述上饶境内六个古城的变迁,只是上饶历史沿革变迁的很小一部分。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发现更多古城变迁的情况。古城的变迁是极其宝贵的饶信文化历史资料,它反映了这个地方聚落的起源及其演变,还可以说明许多历史问题,对当时上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研究颇有助益。在研究上饶古今变迁发展嬗变的沿革时,我们看到了上饶历史上的风雨烟云,难免引发沧桑感。上饶的地域文化是多元融合:雅文化与俗文化、市民文化与精英文化、本地文化与外埠文化、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在这里交融发展,而这些古城的变迁,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的变迁。

历史上上饶境内古城变迁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中央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皇帝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并通过军政官僚机关管理、控制国家的政体。我国古代行政区划制度因时代的变迁而变革,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是在前朝的基础上设立了自己的行政区划制度,并给予调整。其根本原因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约束力,以巩固和维护其统治地位。像兴安、万年的设立,都是

为了把原来太大的鄱阳县和余干县划小而治。所以,上饶古代行政区划变迁的规律是:数量由少到多,辖区由大到小,层级由高到低。

二是政治变动与经济发展。政治变动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像万年的荷溪古城,主要是为了防止和消灭王浩八的农民起义军。经济发展也与上饶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的变迁密切相关,像鄱阳、余干一向是水陆运输的中心,水运发达,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也就较快,其行政区划地位也较高,秦汉时鄱阳县管辖的地盘比整个上饶市还要大。

三是自然地理环境因素。所谓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正是表明了自然地形对于行政区划的重要标志作用。像婺源原属安徽省管辖,但事实上,婺源县与德兴市同属一个山脉,同饮一条乐安江水,自然地理十分接近,理应归入一个辖区。一般来说,在高山、河流的两侧都会形成不同的风土人情,因此,按照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划分行政区划有利于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和风俗文化的形成。古代的上饶县,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独为一个行政区域再好不过,因此,就有广信府的诞生。

针对这些上饶古城的变迁史,我们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深入挖掘这些古城变迁的原因,拿出变迁的史料,寻找变迁的遗址和遗迹。
第二,开辟古城遗迹旅游,甚至可以形成一条特色旅游线路。
第三,研究上饶古城变迁的文化,提炼出几条带规律性的东西出来。
第四,将上饶古城变迁的历史放入即将布展的市博物馆中,向市民作全面介绍。



远去的炊烟

杜维民

黄昏,古镇沐浴在金色的余辉中,叽叽喳喳的小鸟呼啦啦地飞离田野,电线,开始归隐山林。在山上、河边疯玩的我,远远地看见拥挤挨挨的屋顶烟筒升起了袅袅炊烟,便拣起藏在草丛中的书包飞奔回家。

走进厨房,母亲正在弥漫烟雾的灶台前忙碌,一会往灶膛里添柴,一会往锅里翻炒,那柴“呼呼”燃烧,母亲说火发笑,客来到。我看到案板上碗刚出锅的小鱼,撮一条扔进嘴里解馋。开饭喽,我把一碗碗刚出锅的菜端上八仙桌。母亲把炭火钳进瓦缸,在缸口封块砖,然后把未烧完的柴扯到门口,淋勺水,“味”地蹿起一团浓烟。顿时,柴头变成了黑炭。她走出厨房用围裙拍身上的灰尘,脸却变成了花猫。

那时,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年代,物资匮乏,一些米面油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都要凭票供应,生活极度贫困,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回荤。由于肚里没有油水,一日三餐盼饭吃,我常在灶间转悠。一天放学回家,母亲让我去外面拣些破砖来,她嫌火炉(泥胎灶)不好烧,正在请石匠砌大灶。那是当时最时髦的灶,铁锅镶嵌灶内,灶台铺上白瓷砖。这种灶不仅干净,而且方便,炒菜时可以把油盐酱醋放上灶台,一锅可炒十几桌菜,适合做喜事。傍晚,灶砌好了,母亲试烧,只见未干的灶膛冒出一团团水气,浓烟通过烟筒排向屋顶。石匠坐在门楣上一边吸烟,一边聊做灶的讲究。一会,母亲端出刚烧好的煎泥鳅、辣椒炒鸡蛋、萝卜炒肉等菜肴,请石匠吃饭。砌了新灶,母亲很高兴,还用新灶蒸了灯盏糕给邻居品尝。不久,母亲脸上又布满了愁容,一是大灶费柴,二是有时天空气压低,烟倒灌进厨房,熏的人睁不开眼。雨天,厨房瓦缝里便会漏水。母亲一边炒菜,一边让我端脸盆接水,那雨滴敲打脸盆的“叮咚”声,使人心烦。寒冬,瓦沿下挂起了冰凌,母亲早早地钻出温暖的被窝,在四面漏风的厨房用竹片,刨火引燃柴火,烧水、淘米、煮稀饭,喊我起床上学。喝着滚烫的粥,我心里暖洋洋,也体会母亲的辛劳。为了减轻缺柴的压力,放学后我用带钩的竹竿去拉树上的枯枝、沿路拣柴。星期天,我和哥哥姐姐们用牙缸带上饭菜走十几里山路去砍柴。天漆黑,才挑两捆柴往家里赶。路头上,父亲早早地候在那左顾右盼,看到我们的身影,奔上前接过我肩头上的担子。回到家,筋疲力尽的我掀开水缸盖咕嘟咕嘟灌下一勺冷水。后来,父亲请单位的司机每年从山里带些柴来。他弓腰拉着小山似的板车,我使劲在后面推,把柴拉回家,再把它锯成尺许长,劈好的柴码成半边墙,劈不动的柴就留到过年烧旺火。腊月廿三,灶王爷升天,家家户户在灶间摆上香案、供品,请灶神上天说好话,保下界平安。有诗云:年年有个家家忙,二十三日祭灶王。当中摆上二桌供,两边配上两碟糖,黑豆干草一碗水,炉内焚一股香。当家的过来忙祝贺,祝贺那灶王老爷降吉祥。”

几年后,我家柴灶改成了煤球桶,再也闻不到柴火味。但烧煤24小时不断火,冬天有热水用。长大成家,我下班在单位打饭,用煤油炉放在过道上炒菜,吃喝拉撒全在一间公租房,儿子的小脑袋常常被桌角碰的“哇哇”大哭,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改革开放后,我妻子在郊区供销社承包了柜台,自己跑义乌、上海进货,当起了小老板。几年后,我们用赚到的钱买了套90平方米商品房,厨房添置了燃气灶、抽油烟机。想吃吃什么就买什么,天天荤素搭配,再也不用为吃而犯愁。

现在,孩子们在外地工作,我和老伴两人在家,烧饭用电磁炉,电饭煲,厨房变成了电气化,彻底告别了烟熏火燎的日子,就连农村的亲戚都用上了沼气灶、燃气灶。山上的杂树、茅草再也无人问津,生态环境日益好转。吃过晚饭,我和老伴迎着习习晚风,在河边散步。只见广场上、公园里,到处都是跳街舞、打太极、走路锻炼身体的人群。炊烟已变成了遥远的记忆。

蜜蜂谷

雨途

五府山位于武夷山脉的北麓,地处闽浙赣交汇处,自古以来人迹罕至,保存了相对原始的山水和生活状态。从赣东北重镇上饶市城区出发,向南三公里过了前进桥,就到了五府山所在的上饶县境内,再驱车50多公里,便进入五府山山区。沿路青山绿水,满眼的田园风光。在路经大坳水库后,便正式进入五府山山界。再进过五府山镇治所在地——甘溪,一条小路沿溪水而行蜿蜒地伸向五府山神秘的深处。在溪口;中华蜜蜂谷”的醒目石碑顿时让你忽然觉得得到了陶渊明笔下世外桃园的洞口。强烈的好奇之心驱使向你更深的大山深处探寻。

这里是中华蜂的原产地,也是中华蜂种的保护区。在开车沿溪水行进约数公里之后,一个巨大的人工建筑怪物出现在眼前,上小下大的一个黄色圆台,给这大山深外加了一层诡秘的色彩。其实这是仿当地土蜂箱造型建造的一个建筑物,这也标志着到了中华蜂养殖基地了。

在五府山蜂场,我们请蜂工打开了蜂箱,见识了一下蜜蜂——这甜蜜的工程师的居所。看着满排的小蜜蜂可爱的样子,再看看五府山完美的生态,在这空气都透着甜味的大山里,想象得出,这里的蜂蜜该有多甜。

山沟里人家不多,也都临溪而居,依山而建。村子很小,大的也就十几户人家的样子。村子都基本保持着传统的民居风格,但都透着现代化的气息。在一个叫船坑的小村里,环境整治,垃圾杂物堆放有序,以当地土菜为主的农家乐,吸引了远方的源源的食客。吃着农家菜,听着溪水声,赏着日出日落,呼吸着纯净的空气,整个的身心都松弛了下来。



三清山鹅公岭西坑的瀑布群

有人认为,三清山虽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但缺水。用图说话!地处北纬28°而山多水多的上饶怎么会缺水?三清山当然也不会缺水。三清山,东有金沙溪和三清湖,北有休泉水和李宅水,西有龙头山水和南溪,南有玉琊溪和王宅湖。在东北鹅公岭下,西坑大断裂带长3公里的峡谷有一组由翠帘、玉帘、虹帘、珠帘、雾帘、青帘、莺帘、凤帘、晶帘等组成的连续跌落的瀑布群。

郑大中 文/图



兴安窑

吴印

宋时期,横峰就有烧造陶瓷的窑。明初设丫岩巡检公署,始建地方政府。明朝嘉靖三十九年(1560),分别从上饶、弋阳两县划出一部分地域,建立兴安,隶属广信府,设县治于横峰镇(即今岑阳镇)。横峰窑(又称兴安窑),即得名于此,江西历史名窑之一。

横峰窑历史悠久。早在北宋时期,横峰山峦叠翠、竹林茂密、溪水清澈、资源深邃,一片绚丽多姿的宜人景色。先民在这世外桃源之地,构建起了土垣茅屋或竹顶棚居,仍以薯蓣参半之杂谷粗食。他们点燃起龙炉的篝火,开始从事民间手工造瓷工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通过漫长岁月的磨砺和发展,横峰窑便很快跻身于江西名窑之列。

据史载,元末明初 兴安窑,故为信之横峰市镇,固圉,徙处州居民其地,世以陶碗为业……”据此可知,由于浙江处州移民迁入(处州——今浙江丽水地区),翟志高等以陶碗为业之能工巧匠者,融入横峰瓷业生产,与当地人民共同开创横峰铸瓷工艺历史。

明代中叶,造瓷规模与工艺水平达到横峰窑的鼎盛时期。巨擘《新建兴安记》称:“成化弘治间,利源日开,生齿日盛”。于是横峰窑地日益繁盛;“民工荟萃,窑场盘筑,炉火撩云,窑城映月。”因此,明政府鉴于横峰兴旺繁荣的造瓷景象,于1368年正式设立县署——兴安。民间相传:兴安有一百口井、一百座桥、一百余窑、一百座窑”。其时兴安人口不足万计,然而调查资料却显示,横峰早期摄缀之古窑古遗址甚,其中百窑之誉亦不为其过。这个谱缀历史情结的民间传

说,便是横峰窑兴旺景象的真实写照吧。

然而,由于千百年来,历史上的沧桑巨变,自然力的冲刷和人为垦运,众多的窑址均遭至不同程度的破坏及损毁,惜往窑场、瓷炉都夷为平地。近年来,特别是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后,人民政府与各级主管部门采取了多项措施,对窑址开展调查、研究,加以整理与保护,让横峰窑在今日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生活中,焕发出历史文化的光芒。

宋代时期,横峰窑便跻身于江西名窑之列,当时江西瓷业盛极一时,著名的景德镇窑、横峰窑、吉州窑、南丰窑、白舍窑及赣州七里镇窑、乐平窑、金溪窑、宁都窑、靖安窑、铅山窑、婺源窑、九江窑、南丰窑、新干窑、寻乌窑、名窑林立,各有千秋,构成了江西瓷业繁荣兴盛的空前景况。《江西考古》1983年1月)

横峰窑由盛而衰,约在嘉靖建县期间,至清康熙时,横峰窑已完全衰落,只剩一片废墟。据《横峰县文史资料》称 清初,故知县胡世裕于康熙22年(1683年)到任时不胜感叹,俯览荒城,仅五十余家”……窑民乃移窑于弋之湖西马坑,俗犹呼横峰窑。《江西陶瓷沿革》)。

清代,横峰窑已长时间没有恢复,至光绪30年,才由乡绅滕诚出面,集股复立古瓷场。是年九月,征集了300股,每股洋银一百两《农工商矿纪略》);“兴大小瓷窑二座,坯房三百多间,春料水碾二十余口,辅房二所,烧出瓷器尚属可观”(《江西官报》第八期)。“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光绪33年,不意连年耗折,兼又被水冲坏,除原集之股金不计,尚

亏累不下数万金,近来大窑已停,小窑厂所出之货正粗,势难再振”。(《农工商矿纪略》)烧制有白地青花、青地白花,即上述的“白料”两种。1983年冬,横峰县邮政局在兴安路铺设电缆与县工商行基建时,出土了一些青花瓷堆积,堆积分为两个层次,上层胎土粗黄,釉色发黑;下层胎土细白,青花釉色纯正。出土标本器物类型少,以喜字罐为主,胎土细腻,青花尚属纯正。

1987年民间又征集青花人物纹茶壶一件,白地青花。器底都书有“兴安窑造”题款。青花瓷烧造工艺采用匣钵叠烧法,有碗、罐、盘、壶、调等生活实用器。型塑轻薄,线条圆润,胎土细白,釉色微黄,青花偏灰或黑。青花纹饰见人物、草花、虫鱼等。

泽古慨今,约八百年前的北宋以至明代中叶,横峰窑曾创造了规模恢弘、廖廓江天的空前历史景况,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是何故导致了横峰窑由盛而衰,直至一蹶不振呢?在为之叹息忧闷之余,后人各叙己见,学说纷纭。有的称“官庭瓷窑是官民窑之间的主要差异”。但民间造瓷历代不息,百世流芳的例证又不乏存疑。还有者认为交通阻碍了造瓷的发展等。都无法从客观上去证实横峰窑衰弱之根本原因所在。

为探索这一历史疑惑,世人问津师以寻源求真。据《新建兴安记》载:“嘉靖建县前后,此时民稠土竭,生理渐微……”据知到了明嘉靖间,窑场稠密,人口大增而瓷土愈少,由此造成高岭土、燃料生产、生活资源日益匮乏,而陶瓷生产机制则渐渐衰微。又据《江西通志》记载:“嘉靖间,横峰窑镇地,

改立兴安,窑遂废”。此记“窑遂废”又与建立县治有关。为求实论据,文博部门遂对窑址现场与环境地进行观察考证,调查结果表明,窑址地现场瓷土确实土竭夷尽,但古窑周边一些山包丘岭,如横纺器厂厂部内的山丘以及西至北门一带垦基处,仍发现有瓷土,且有一定量存在。

据此分析,横峰窑烧造规模之大与瓷土需量的不足确属客观,但不至于形成生产与运输对立矛盾。或许这与当时技术设备与运输条件的制约相关,因窑民一般都在资源丰盛地起窑,仅限于就地或就近获取资源就地生产,擢于异地取运,至使陶瓷生产资源受到限制。

清代后期的复窑造瓷亦可为例。其二,关于“立县署,窑遂废”记载,通过调查发现:一、县中山背腹地明代所建城墙就砌筑在窑场之中;二、东门外墙墙、洞门则皆由窑具匣钵、窑渣甚至窑汗(窑炉烧结面)所构筑而成。由此而论,建县筑城与“窑遂废”含存因果联系,但结论应是建县时,恰逢窑衰期。“……明代以后,景德镇以外的许多窑场都日趋衰落。钧窑系的各种产品全部停止生产;龙泉系青釉瓷虽在明初仍继续大量烧造,但它已无法和景德镇的釉下彩、釉上彩、斗彩以及丰富多彩的高低颜色釉瓷相匹敌。”据此所知,元代景德镇丰富多彩且技术含量很高的各类色釉瓷新品牌的创新成功,逐渐崭露头角于全国市场,形成对各窑场的波动与冲击,许多名瓷生产趋于停烧,即为窑业转型期。可谓“语破天机,真相大白”。